

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用书



中国古代文学



2

辽宁省教育学院系统中国古代文学组编写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中国古代文学
(2)

372

辽宁省教育学院系统
中国古代文学组编写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 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270,000 开本: 787×1092¹/₈ 印张: 11³/₄
印数: 1—7,000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陈贵田 责任校对: 陈文本
封面设计: 安今生

统一书号: 10371·20 定价: 2.20元

目 录

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简述	(1)
谏逐客书	李 斯 (46)
过秦论	贾 谊 (55)
论贵粟疏	晁 错 (66)
报任安书	司马迁 (78)
项羽本纪 (节选)	司马迁 (112)
苏武传	班 固 (144)
七 发	枚 乘 (169)
子虚赋	司马相如 (202)
刺世疾邪赋	赵 壹 (211)
陌上桑	汉乐府民歌 (218)
东门行	汉乐府民歌 (222)
古诗为焦仲妻作并序	汉乐府民歌 (225)
行行重行行	古诗十九首 (241)
短歌行	曹 操 (244)
燕歌行	曹 丕 (248)
白马篇	曹 植 (252)
赠白马王彪并序	曹 植 (255)
七哀诗	王 粲 (262)
悲愤诗	蔡 琰 (266)

咏怀诗(其一)·····	阮 籍(273)
咏史(其二)·····	左 思(275)
归园田居(其一)·····	陶渊明(277)
饮酒(其五)·····	陶渊明(280)
读山海经(其十)·····	陶渊明(283)
登池上楼·····	谢灵运(284)
拟行路难·····	鲍 照(287)
晚登三山还望京邑·····	谢 朓(289)
西洲曲·····	南朝乐府民歌(291)
木兰诗·····	北朝乐府民歌(293)
登楼赋·····	王 粲(298)
归去来辞并序·····	陶渊明(305)
与陈伯之书·····	丘 迟(314)
出师表·····	诸葛亮(323)
让县自明本志令·····	曹 操(330)
桃花源诗并记·····	陶渊明(347)
巫 峡·····	郢道元(354)
干将莫邪·····	干 宝(357)
周 处·····	刘义庆(359)
情 采·····	刘 勰(361)

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简述

在文学史上所谓秦汉时期文学，即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起，笼统地到东汉末年止。将建安文学（196—220）划入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这一时期即自汉献帝建安元年（196）起，到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（589）陈亡止。我们的文学史姑且仍按这两个时期，分别加以简述。

秦 汉 时 期

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由于施政暴虐，赋税与徭役特别繁重，故在秦二世元年（前209）爆发了陈胜、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，推翻了秦王朝的残酷统治。

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了汉王朝。西汉初期，统治者汲取了秦亡的教训，提倡黄老思想，采取与民休养生息政策，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。到武帝时，汉王朝已发展成为强大的封建帝国。但由于武帝穷兵黩武、挥霍无度，致使危机四伏。延及公元8年，王莽称帝，幻想以“改制”来缓和阶级矛盾，但是积重难返，仍不免于公元17年爆发了绿林、铜马等农民起义，导致了西汉王朝的彻底覆灭。

公元25年皇族刘秀借助农民起义，建立了东汉王朝。也如西汉初期，采取与民休养生息政策，阶级矛盾得到相对缓和。

但至东汉中期以后，外戚、宦官争权夺利逐渐剧烈，地富豪强肆意掠夺，人民生活极端贫困，于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。继之形成军阀割据、互相混战的局面，人民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汉献帝建安时期（196—220），汉室名存而实亡。公元220年曹丕称帝，结束了东西汉四百年的历史。

秦汉时期，秦朝禁锢思想，摧残文化，故而文学很不发达，据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有杂赋九篇，惜已佚失。另有李斯《谏逐客书》及《吕氏春秋》。后者共二十六卷，一百六十六篇，分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，兼有儒、道、墨诸家学说，为杂家代表作。

汉代文学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，及其自身继承与发展的规律不停地前进着。题材的广泛性，体裁的多样化，都超过了先秦文学。在散文方面，有政论散文、学术散文、历史散文等；在辞赋方面，有骚体赋、散体大赋、抒情咏物小赋等；在诗歌方面，有乐府民歌及五言诗等。这些体裁的文学创作，无论是对于当时的社会作用或后代的文学发展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

散 文

汉代散文产生的历史条件是：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，尖锐复杂的阶级与民族矛盾，吸引作家们的关心与思考；先秦的史传散文、哲学散文的高度成就，为汉代散文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。汉代散文便是继承先秦散文言之有物、生动自然的风格而发展起来。

一、政论散文

所谓政论散文，即指议论时政的奏、疏、表、策等文章，和讨论社会、政治等问题的专著。重要作家有贾谊、晁错、王符、崔实及仲长统等。

贾谊（前201—前169），河南洛阳人。文帝时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。官至太中大夫，因提各种改革意见，遭到旧派大臣周勃、灌婴等排斥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。后迁为梁怀王太傅，因怀王坠马死，感伤过度而死，终年仅三十三岁。

贾谊著有《新书》五十八篇。以其卓越的政治远见，主张强化中央集权，削弱诸侯王的权力。他在《陈政事疏》（又名《治安策》）中提出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的政策，以巩固中央集权，维护国家的统一。他以儒家仁政的主张与民本思想，在《大政》篇中警告当政者说：“自古及今，凡与民为散者，或迟或速，而民必胜之。”在《过秦论》上篇中，以秦八代兴亡的史实，提醒当政者必须施行仁政，以免重蹈秦灭亡的覆辙。在经济方面，于《论积贮疏》中，针对时弊提出以农为本，以达到“蓄积足而民乐其所”的目的。

贾谊的政论散文，能抓住当代的重大问题，畅论得失，带有战国纵横家议论的余风，善于铺陈渲染。并以磅礴的气势，犀利的笔锋，简明丰富的文辞，将这些重大问题论述得详尽而又透彻，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。

晁错（前？—前154），颍川（今河南禹县）人。景帝时官至御史大夫，力主改革政治，加强中央集权，削弱诸侯王势力。遭到诸侯王反对，袁盎谗毁，被腰斩于市。他有著作三十一篇，以《论贵粟疏》、《守边劝农疏》、《言兵事疏》等最著名。

如《论贵粟疏》，第一，论述粟米布帛与社会人生的重要关系，将其重要意义提高到“政之本务”的高度。要求当政者，应“薄赋敛，广积蓄，以实仓廩”。第二，揭示了“文景之治”的各种社会矛盾，如大地主对于农民的盘剥，富商勾结王侯对于农民的压榨等。第三，提出“贵粟之道”的办法，即“以粟为赏罚”而达到民富国强与巩固政权的目的。

晁错的政论散文，论理言事，切中要害，分析透辟，逻辑严密，文辞雄辩有力，通达流畅。鲁迅曾于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赞誉他与贾谊的文章说：“皆为西汉鸿文，沾溉后人，其泽甚远。”

王符（85？—162），安定临泾（今甘肃镇原县）人。个性耿介，终生不仕，著《潜夫论》三十五篇。文章朴实无华，笔锋犀利，对当时官场的黑暗腐败，豪门贵族的贪婪残暴，社会风气的败坏，作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。

崔实（？—170？），涿郡安平（今属河北）人。官至尚书，因乱世，托病不理事免归。其代表作《政论》，对当时“政令垢玩，上下懈怠，风俗雕蔽，人庶巧伪”进行了大胆抨击，为当世称颂。

仲长统（180—220），山阳高平（今山东金乡西北）人。献帝时为尚书郎，后参与曹操军事。著《昌言》三十四篇，批判天命观和谶纬迷信，提出“人事为本，天命为末”的论点。指出天下由治而乱，是由于统治阶级“熬天下之脂膏，断生人之骨髓”的残酷剥削，深刻地揭露汉末的黑暗现实。文章结构严密，语言朴质，由于辞赋影响，带有铺陈、排偶的特点。

二、学术性散文

带有哲理性、学术性的论说散文作家，有刘安、桓宽、桓谭、王充等。

刘安（前179—前122），高祖刘邦之孙，淮南王刘长之子，文帝时受封淮南王。曾奉武帝命作《离骚传》，认为《离骚》可与日月争光。他主持编写的《淮南子》（原称《淮南鸿烈》，全书二十一卷。其中除保存一些神话故事外，其他论说散文，有的针对时弊，进行批判，并指出正确方向。如《主术训》，认为君主必须有治国的道术：“若贪主暴君，挠于其下，侵渔其民，以实无穷之欲，则百姓无以被天而履地矣。”“食者民之本也，民者国之本也，国者君之本也。故人君者，上因天时，下尽地财，中用人力。是以群生遂长，五谷蕃植。教民养育六畜，以时种树，务修田畴，滋植桑麻。肥堯高下，各因其宜。”首先批判贪主暴君，同情人民不幸遭遇。继而指出食、民、国、君之间的依存关系，最后指出国君务政的根本。该书语言质朴自然，句法整齐匀称，多用排比与比喻，写作技巧较高，文学性较强。

桓宽（生卒不详），汝南（今河南上蔡县西南）人。宣帝时举为郎。官至卢江太守丞。公元前70年后，他根据昭帝始元六年（前81）御史大夫桑弘羊与贤良、文学辩论盐铁政策等问题的记录，编撰成《盐铁论》六十篇。其中涉及到财政、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水旱、徭役及学术等各方面的问題。语言简洁流畅，浑朴质实，行文整齐而有变化，疏朗中又见细密，善用对话表达人物思想、神态。在而汉散文中，独具一格。

桓谭（前40左右—后32左右），沛国相（今安徽宿县西

北)人。光武帝时，任议郎给事中。喜抨击俗儒，并坚决反对谶纬神学，几乎被杀。著《新论》二十九篇，提出“以烛火喻形神”的著名论点，断言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，正如烛光不能脱离烛体。王充称其“论世间事，辩昭然否，虚妄之言，伪饰之辞，莫不证定。”（《论衡·超奇》）

王充（27—97？），东汉著名思想家、文学理论家。字仲任，会稽上虞（今属浙江）人。出身寒门，中年后曾做过州郡小官。后罢官居家，专门从事著作。他以毕生精力，历时三十余年，写成巨著《论衡》，共三十卷，分八十五篇（现缺《招致》一篇）。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，批判了当时宗教神学与各种虚妄荒诞的迷信，批判了崇古非今的历史倒退论。在文学理论上，如在《自纪》、《佚文》等篇中，主张文章应有社会实用价值，要求文章应起到“劝善惩恶”、“匡济薄俗”的教育作用，反对“徒用笔墨，为美丽之观”；要求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，即“外内表里，自相副称”，反对“雕文饰辞”、“言过其实”；认为古今文章并无高下之分，批判了贵古贱今的文学观；认为文章贵在创新，反对摹拟因袭的不良之风；强调文学语言应浅显通俗，力求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统一。这些理论，对于魏晋以后的文学理论者很有启迪。

三、历史散文

汉代的历史散文，继承了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史传文学的光辉传统，至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发展为光照古今的高峰。

司马迁（前145？—前87？），西汉最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

家。字子长，夏阳龙门（今陕西韩城北）人，太史公司马谈之子。十岁随父到长安，就师于大经学家董仲舒与孔安国。二十岁开始漫游于湖南、江西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南等地，返京后任郎中。曾奉使西南，侍从武帝巡狩，足迹几遍全国。到处探访古迹，采集传说，考察风土人情，积累了丰富的材料。元丰三年（前108）继任太史令，博览了国家藏书。天汉二年（前99）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，下狱，受腐刑。出狱后任中书令。发愤著述，约于征和二年（前91）撰写成上自轩辕黄帝，下至武帝，将近三千年的我国第一部通史，时称《太史公书》，三国后始称为《史记》，共一百三十篇。

《史记》的体例：《本纪》十二篇，记历代帝王世系事迹；《年表》十篇，简记历史大事；《书》八篇，记专题事件始末；《世家》三十篇，记王侯贵族世系事迹；《列传》七十篇，记历史各种人物的生平言行事迹。其中《本纪》、《世家》、《列传》是全书的主要部分。三者皆以人物为经，以事件为纬，来反映历史大事，再现了历史人物形象。这一新的写史方法，是司马迁的首创。

《史记》的进步性，主要表现在：第一，作者从客观的历史实际出发，来观察历史的发展变化，不仅写了上层人物的历史，也写了各个阶层人物的历史，反映了他全面的历史观。他不承认历史永远是一朝一王一姓万世不变的历史，而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。他在《陈涉世家》中，高度赞扬陈涉起义，认为其与汤武革命，具有同样的正义性与历史功绩。所以如此，正是从他这种历史观出发作评价的。第二，作者重视历史事实，对历史人物或褒或贬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因此被称为“实录”。对此，班固进一步解释：“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

虚美，不隐恶”。的确，不论最高的帝王、将相大臣，或地方官吏，既不抹杀他们的功绩，更突出的是他勇于揭露统治阶级的贪婪，残忍、腐朽、偏私、愚昧等等，甚至连当今皇帝，也敢于指责。他的《今上本纪》，使武帝看了大为恼火。在《酷吏列传》中，不仅揭露了嗜杀成性的王温舒，而且也讽刺了武帝偏偏喜爱并提升了这个众人恨之入骨的刽子手。对于爱国英雄或有重大贡献的人物，如廉颇、蔺相如、李广等，他以饱满的热情和崇高的敬意，热烈歌颂他们的英勇行为与高尚品德。即使对于一些普通小人物，如郭解，朱家等，也满怀深情地歌颂他们侠义行为与高尚情操。

《史记》在艺术成就上，最重要的特点，表现在描写人物上，第一，是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。如在《项羽本纪》中，作者以饱满的激情、热烈赞扬项羽的勇往直前、摧毁秦王朝暴力统治的功绩和精神，同时也带几分惋惜的情绪，谴责他胸无大志，头脑简单、粗豪自恃、无比残暴的致命缺点。第二，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。根据作者对于人物的认识来取舍事件，一般是选取人物活动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大事件，但也选取能突出表现人物性将的小事件，往往就是用这些细节描写，鲜明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特征。如在《李斯列传》中，描写李斯“观仓中鼠食积粟”后而发的一些感慨，鲜明地表现了李斯的抱负和志向。又如《项羽本纪》中，描写樊哙“闯帐”的那些细节，将樊哙的怒容，勇猛、豪爽等等的性格特征与表现，栩栩如生地呈现于读者之前。再者，作者无论选取大小事件，都是通过人物间具体活动，使之故事化，使之成为历史画卷。如此，不仅能显示人物鲜明的个性，而且能达到与共性的统一。第三，在语言运用上，最突出的特点是，方言土语、成语，谚语、歌谣的广

泛采用；行文明快而含蓄，简炼而繁富，不拘一格。尤其重要的是，用语依照人物的特征，以表现各个人物的个性与精神面貌。如在《张丞相列传》中，描写口吃的周昌，他不同意高祖废太子，而对高祖说：“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期期知其不可！陛下虽欲废太子，臣期期不能奉诏！”不仅表现了周昌独有的口吃特点，同时又表现了他刚直而带几分憨厚的特性。

正因为《史记》在思想性与艺术上都有伟大的成就，所以它对后代的史学、学术、文学、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。宋人郑樵于《通志序》中说：“百代以下，史官不能易其法，学者不能舍其书。”鲁迅先生于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称其是：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。”

班固（32—92），字孟坚，扶风安陵（今陕西咸阳）人。东汉著名的史学家与文学家。汉明帝很赏识他的才华，召为校书郎，并任命为兰台令史。奉诏于兰台撰写《汉书》。该书记事始于高祖元年（前206），终于王莽地皇四年（23），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断代史。全书包括《本纪》十二篇，《表》八篇，《志》十篇，《列传》七十篇，共一百篇。

《汉书》是受诏而作的官书，作者是站在儒家正依思想的立场，为封建王朝服务，缺乏批判现实的精神，轻视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，而成为“追述功德、傅会权宠”的官吏。另如将项羽、陈涉等贬入《列传》，以降低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；将郭解等诬蔑为“窃杀生之权，其罪已不容诛矣”的强盗。但作为史学家基本上还是尊重历史的，如在人物传记中，也暴露了某些官吏的种种罪行，有助于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。象《霍光传》中，反映外戚的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行。其次，作者也描写了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物，如《苏武传》中的苏

武。他不为利诱，不畏剑逼，爱国忘身，坚持民族气节的精神，给人以深刻的感受。特别是在苏武与李陵的交往中，作者运用对比的方法，更反衬出苏武精神的可贵和品德的高尚。对比与细节描写，是作者表现人物常用的两种方法。《汉书》的语言虽无《史记》那样通俗化口语化、简洁明朗、浅易近人的特色，但它的洗炼整饬、详赡严密、富丽典雅的特长，也常引起后代众多散文家的喜爱。

袁康（生卒不详），东汉初年史学家与文学家。著《越绝书》二十五卷，今存十五卷。记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史实，重点叙述伍子胥、范蠡、文种等人的活动。多采传闻异说，是介乎正史和小说之间的作品，对后世小说、戏曲颇有影响。

赵晔（生卒不详），东汉史学家与文学家，会稽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著有《吴越春秋》，原书十二卷，今存十卷。记述吴越争霸的史实，但不拘泥历史事实，增入不少民间传说，故事较曲折生动，细有小说意味。对后世小说、戏曲影响较大。

四、其他散文

汉代的书信体散文与记事散文、亦颇具文学特色，今择其要者简述于下。

邹阳（约前206—前129），西汉文学家，齐（今山东东部）人。曾上书谏阻吴王刘濞谋反，不纳，遂去为梁孝王刘武门客。他有智略，慷慨不肯苟合。后被谗下狱，写《狱中上梁王书》。书中博引史实，铺陈排比，雄辩而委婉地劝说梁王不要听信谗言。梁王见信，深受感动，立即释放了他并传为上宾。邹阳文章颇有战国游士纵横春辩的风格，故《汉书·艺文志》

将其列入纵横家。

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（又称《报任少卿书》），其背景是：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，掌管宫廷机要事务，他的朋友任安写信给他，让他积极向朝廷推荐贤才，所以他给任安写了这封回信。信中，司马迁向任安详细叙述了自己下狱受刑的经过，抒发了受刑后的痛苦和怨恨，说明了他忍辱苟活是为了完成《史记》。回答了他所以不能推荐贤才的原因，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残酷。全文反复曲折，首尾呼应，夹叙夹议，引古喻今，情真意挚，感慨极深，确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。

刘向（前79—前8），汉宗室，西汉著名的学者与散文家。著有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列女传》等。分类纂辑先秦至汉的史事及寓言小故事等，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。有些民间故事和传说，很富有教育意义。如《说苑》中的《螳螂捕蝉》，《新序》中的《叶公好龙》，《列女传》中的《珠崖二义》等。这些记事散文，辞浅理畅，用意深切，在舒缓记叙中，流露出匡救时弊的热情。

辞 赋

赋作为一种文体，最早见于战国时荀况的《赋篇》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说：“然赋也者，受命于诗人，拓宇于楚辞也。于是荀况《礼》《智》，宋玉《风》《钓》，爰锡名号，与诗画境，六义附庸，蔚成大国。”这就是说汉赋的远源是《诗经》，近源是《楚辞》。班固在《两都赋序》中说：“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”也道出了汉赋的远源。

汉初的辞赋直接受楚辞影响，故称骚体赋。作家有陆贾与贾

谊，正如刘勰所说：“陆贾扣其端，贾谊振其绪。”陆贾的赋惜已佚失，贾谊的代表作是《吊屈原赋》与《鹏鸟赋》。前者为作者被贬为长沙王太傅途经湘水时而作，借悼念屈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、理想不能实现的愤慨；后者为作者到达长沙三年时，因鹏鸟“集于其舍，止于坐隅”，“自以为寿不得长，伤悼之，乃为赋以自广。”（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）作者认为吉凶、荣辱、祸福皆无足介意，绝不能与浊世同流合污，但文中透露出消极遁世思想。

贾谊赋的特点，以抒发情志为主，体察物象，描写事物，只是为了更好的表达情感；大量运用四言，句式比较整齐，既有诗的特征，又有趋向散文的迹象，显示出从《楚辞》向新体赋过渡的趋向。

枚乘（？—前140），淮阴人。曾任吴王刘濞、梁王刘武的文学传从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其赋九篇，其中《七发》最佳。它是标志汉代大赋初具形态的第一篇作品。其内容是吴客以七事而启发楚太子。通过反复问答，为其指出病源及治疗方法。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圣贤之言有益，批判了统治阶级上层腐朽的生活方式。此赋结构宏伟，通篇几乎全为散体，富于夸张铺陈；辞藻富丽，善于描写物象；借主客问答方法，联系段落章节。《七发》已基本上形成汉代散体大赋体制，因而它是从《楚辞》过渡到汉代大赋的重要作品。

自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，历经二百余年，是大赋发展的全盛期。武帝时大赋极为发达，赋家荣出，这是与当时政局的稳定、经济的繁荣、统治者的爱好分不开的。这时汉赋才真正成为散体大赋的固定形式，奠基者是大辞赋家司马相如。

司马相如（前179？—前118），字长卿，成都人。他的赋

影响了两汉整个赋坛，成为赋家摹拟的标本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其赋二十九篇。今存比较可靠的名篇，有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、《大人赋》、《美人赋》及《哀秦二世赋》等。最负盛名的是前二者，通过子虚、乌有、亡是公的对话，分别盛夸诸侯天子苑囿之大，狩猎之盛，主要歌颂帝王的威权与尊严，篇末归之于节俭，确定“劝百而讽一”的形式。

司马相如的赋，结构的宏大，纵横自如，词汇丰富，文采华茂。鲁迅先生于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说：相如“制作虽甚迟缓，而不师故辙，自摅妙才，广博宏丽，卓绝汉代。”但这种大赋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。如写一个打猎活动，用了很多笔墨，堆砌很多词藻，反衬出内容的空洞；分段铺写，形式呆板，很少变化；夸张失实的描写太多，故司马迁于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中指出它多“虚词滥说”。此外，生僻字词连篇，艰深难读，严重地削弱了它的艺术效果。

王褒（生卒不详），是继司马相如以后的第二个大辞赋家，字子渊，蜀资中（今四川资阳）人。原有赋十六篇，今存《洞箫赋》、《九怀》等十一篇，多为歌功颂德之作。其中《洞箫赋》描写声音情调，细致入微，对后代咏物赋和描写音乐的作品都有影响。

扬雄（前53—18）是第三个大辞赋家，字子云，成都人。因传从成帝祭祀、游猎，奏《河东》、《甘泉》、《羽猎》、《长杨》四赋。另有《逐贫赋》与《蜀都赋》等。扬雄晚年认为辞赋“劝百而讽一”，无补于人心世道，斥之为“雕虫篆刻”、“壮夫不为”的小技，因而他转为研究老庄哲学，写有《太玄》、《解嘲》等作品。

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之一，其主要作品有《两都赋》（即《东